

高教信息参考

2020年第3期（总第七期）

济宁医学院发展规划处

2020年7月13日

目 录

前沿信息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正式通过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

教育部等八部门：全面提升高校思政工作质量

山东“五权下放”释放高校发展活力

综合改革

立足学院治理改革促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高教视点

未来医学院的十个重要特点——并非不可能的梦想

大学论坛

来茂德：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药

高校动态

高校部署“过紧日子”

又一超强跨地区高校联盟成立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正式通过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

近日，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以“无条件通过”成绩正式获得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医学教育认证机构认定，标志着我国医学教育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等效，医学教育认证质量得到国际认可。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是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医学协会（WMA）于1972年联合创办，以保障全球医学教育质量为宗旨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在全球医学教育标准的制定和推动医学教育改革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各国医学教育认证机构只有通过WFME机构认定，其认证结论才被认可，认证过的医学院校的毕业生才能被全球健康卫生行业所接受。

我国自2006年开展医学专业认证试点工作，认证伊始就坚持建立中国质量和国际标准的认证体系，并邀请美国、澳大利亚、韩国和欧洲等认证专家参与中国认证实践。2008年正式成立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工作委员会已建立了与国际实质等效的认证制度体系，组织完成了全国106所医学院校（占比76.3%）的临床医学专业认证。

2018年，工作委员会启动机构认定申请工作，并于2019年10月接

受 WFME 认定专家组的现场考察。2020 年 6 月，WFME 通报中国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机构认定获得“无条件通过”的优异成绩。WFME 资格授予证书正式确认：全面认可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委员会的资质、认证标准与流程、认证后的监督、决策过程；工作委员会所认证的高校的医学教育质量已达到合适且严谨的国际标准。

截至 2020 年 6 月，通过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机构认定的医学教育认证机构遍及五大洲，包括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俄罗斯联邦、荷兰、墨西哥、埃及、巴西、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或地区的医学教育认证机构。

（来源：教育部）

教育部等八部门 全面提升高校思政工作质量

近日，教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建立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为关键，全面提升高校思政工作质量。

《意见》强调，要健全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加快构建目标明确、内容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意见》指出，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公共基础课程。理学、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科技伦理的教育。农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引导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医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艺术学类专业课程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创作观，积极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在日常教育体系方面，《意见》指出，深化实践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动中，创办形式多样的“行走课堂”。繁荣校园文化。坚持培育优良校风教风学风，持续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活动。加强网络育人。提升校园新媒体网络平台的服务力、吸引力和黏合度，切实增强易班网、中国大学生在线等网络阵地的示范性、引领性和辐射度，重点建设一批高校思政类公众号，发挥新媒体平台对高校思政工作的促进作用。促进心理健康。把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纳入整体教学计划，按师生比不低于1：4000比例配备专业教师，每校至少配备2名。

《意见》强调，建设高水平教师队伍。按照“四有”好教师要求，落实政治理论学习、培训轮训、实践锻炼等制度。完善教师评聘考核办法，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第一标准。实施课程思政教师专题培训计划。打造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队伍。严格落实中央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队伍配备的各项指标性要求。完善高校专职辅导员职业发展体系，建立职级、职称“双线”晋升办法，学校应当结合实际情况为专职辅导员专设一定比例的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来源《中国青年报》2020年5月14日 记者：叶雨婷）

山东“五权下放”释放高校发展活力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全省重点工作攻坚年动员大会上对科教改革攻坚行动进行了系统部署。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关于完善高等学校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办法的指导意见》，按照“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完善高等学校绩效工资内部分配办法，坚决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激发高等学校内生动力和办学活力，“五权下放”拉开序幕。

“五权下放”是指将高校研发机构（学科专业）设置权、人才招聘权、职称评审权、内部薪酬分配权、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处置权下放给高校。它体现了省委省政府的战略远见和改革决心，通过事权、人权、财权的下放，理顺高校发展的体制机制，给予高校充分自主权，有力激发山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活力。

高校具有事业法人性质，教育是知识共同体。要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独有的以知识为纽带的管理方式，给高校充分赋权松绑，放开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通过制度创新来激发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为事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活力。

制度创新是新时代山东最强音，作为高等教育新一轮制度创新的突破口，一系列探索在“五权下放”的总体框架下全面展开。

一是下放高校研发机构（学科专业）设置权

高校根据人员编制、内设机构和领导职数的核定标准，自主确定教学、科研和教辅机构数量、名称，编制部门实行备案管理，3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

二是下放人才招聘权

实行招聘方案年度备案制，“一次报备、全年通用”，省属高校在核准备案的年度招聘方案内，自主确定招聘时间和批次，主管机关不再前置审核各批次招聘简章。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直接采取专家评议、组织考察的方式聘用，随到随办，即到即办。

三是下放职称评审权

在 2015 年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的基础上，加强指导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导、管评价，对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及时推动整改，引导高校“练好内功”，主动用好权，自主设定标准条件、自主开展岗位竞聘、自主评价竞聘人员、自主进行聘用管理，为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营造良好环境。

四是下放内部薪酬分配权

高等学校自主搞活内部分配，根据特色发展、人才培养、人员结构和岗位类别等因素，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自主确定收入分配办法，自主确定绩效工资的具体项目、标准，自主实施绩效考核，自主搞活绩效工资分配。指导高校完善绩效工资分配激励机制，到 2020 年底，各高校奖励性绩效工资实际分配总量在绩效工资总量中占比一般不低于 70%。

五是下放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处置权

教学科研人员实行工资、科研绩效和成果转化收入三元薪酬结构，成果转化现金净收益，以及技术转让、作价投资股份等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不纳入学校工资总额基数，给予教师或团队的收益不低于成果转化收益总额的 70%，不高于 95%，由成果完成人自主分配。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来源：山东省教育厅政务新媒体“山东教育发布” 微信号：sdjyfb）

立足学院治理改革促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在高等教育领域，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呼声日益高涨。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最大的症结在于行政化倾向和行政化管理模式。从根本上说，行政化体现为“管理大学的行政化”和“大学管理的行政化”。因此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质则在于改变大学之于政府的从属关系和大学学术权力之于行政权力的从属关系，去行政化最理想的路径应是自上而下地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目标的系统改革。笔者认为，立足二级学院治理改革是促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有效路径。

第一，二级学院治理改革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本身既离不开自上而下地设计与推动，也离不开自下而上地实践与促进。只有将这两个相向而行的治理改革打通，并使其互相融合，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建成现代大学制度。

目前国内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其成效不甚显著。对此，需要引进自下而上的动力予以补充和配合。学院在大学组织结构中具有特殊地位。学院是大学的基层组织，是一所大学各项功能的最终承担者，其管理水平和运行情况与大学办学水平密切相关。学院治理关注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强调基层学术人员的共同参与，主张扩大学术权力。学院治理有利于增强学术人员在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有利于理顺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有利于营造民主和谐的治

理文化环境。鉴于此,我们可以改变思路,以二级学院治理研究为突破口,将改革重心下移至学院层面,形成一种倒逼机制,通过建立现代学院制度来促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同时,学院治理改革也是学院激发办学活力和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学院治理能够激发基层活力,进而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第二,结构、权力和文化是学院治理研究的立足点与分析框架。

学院治理是大学治理在学院层面的体现,是治理理论在学院组织中的实践应用,是学院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多元权力主体)基于一定的文化基础,为实现共同目标,以民主、协商、互动等方式参与学院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是关于学院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制度化或非制度化安排,以及权责关系博弈和互动过程的总和。据此而言,治理结构、治理权力和治理文化是学院治理不可缺少的三大要素,由结构、权力与文化建构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作为学院治理研究的立足点。

结构、权力与文化在学院治理改革中具有“三位一体”的关系。首先,治理活动的开展要在一种治理结构中进行,学院治理的顺利进行离不开良好的学院治理结构和有效的治理实践;其次,治理是围绕权力的配置与协调而进行的,权力是治理的核心要素,学院治理依靠权力的运行而实现;最后,治理结构的建设、治理权力的运用都离不开治理文化的形成、治理理念的树立、治理制度的制定以及治理传统的传承与变革。虽然,“治理结构”“治理权力”与“治理文化”这三个概念并非可以明确划分,但三者却分别在不同维度规范和约束学院治理活动:治理结构是治理主体处理彼此关系的空间位置,治理权力是治理主体明确彼此职责的核心内容,而治理文化则是治理主体协商共事的意识指导。

在进行学院治理研究中,无论是分析我国大学学院治理现状、比较

国外大学学院治理模式，还是提出完善我国大学学院治理的路径构想，都可以从结构、权力和文化入手。这有利于较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大学学院治理理论与实践问题，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有益思路。

第三，构建“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完善我国学院治理的有效路径。

当前，建立新型“校—院”治理模式是推进大学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流。立足于结构、权力、文化三维分析框架，学院治理的特征是基础性、学术性和自主性，其本质是对权力关系的调整与规定，是一种民主的、平等的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行动、分配资源的“管理方式”。因此在结构上，学院要从统治走向共治，形成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即聚焦学院治理的“结构”问题，重新设计学院组成结构，为不同主体参与学院治理提供依托；在权力上，学院要实现均衡，实现学院各群体对学院事务的治理，以这种方式实现各利益群体力量的“均衡”；在文化上，学院要塑造开放与民主的文化氛围，就是要融通大学的理想与治理精神，在文化理念及实践上落实学院治理。

在坚持学院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前提下，构建符合治理理念的“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是完善我国大学学院治理的有效路径。该构想既遵循了高等教育的办学规律，又契合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并可通过协同学院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学校与学院管理的关系，激发基层学术组织与学术人员的办学活力。

总之，在把握大学学院治理概念与内涵，深入考察和借鉴国内外大学学院治理经验基础上，可通过改善学院治理结构、权力和文化来推动我国大学学院治理改革，进而促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来源：《中国教育报》2020年5月18日 作者：吉明明 南通大学）

编者按:《未来医学院的十个重要特点——并非不可能的梦想》(Ten key features of the future medical school—not an impossible dream) 是国际著名医学教育专家、欧洲医学教育协会 (AMEE) 总秘书长、英国邓迪大学医学教授 Ronald M. Harden 在 2018 年发表在 Medical Teacher 杂志上的文章。作者从医学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出发, 提出了未来医学院校所应具备的十个特征。本文对文章主要思想进行了翻译整理, 以飨读者。

未来医学院的十个重要特点

——并非不可能的梦想

Ronald M. Harden

当前的医学课程没有对医学科学进步、医学实践的变化, 以及病人和公众的期望及时做出反应。以往的医学教育改革相对肤浅, 通常只是浮于形式表面或局限于教育计划的某个方面。许多此类改革反映了不同利益方之间的权力关系, 或是仅对社会提倡的教育多样性与包容性, 增加家庭医生, 强化未来先进技术使用, 以及解决某一学科领域有关问题等呼声做出回应。

本文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医学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未来医学院校所应具备的十个特征。这些建议是基于我过去 60 年作为一名学生、一名教师、一名院长和一名教育研究人员的个人经历, 以及相关已

发表的文献总结出来的，虽然这些目标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全部实现，但本文所描述的在未来是可实现的。我尝试着突破陈规来描述未来的医学院可以是什么样子，以应对当前和未来关于我们如何培训医生相关的挑战。

本文并非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现实的蓝图，文中描述的未来医学院十个关键特征既考虑到医学教育风向上已有的变化，也考虑到那些为未来医生提供适当的培训所必需的条件，事实上，许多学校已经行进在发展上述方法的道路上。

事实证明，SPICES 模型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学校从六个方面对课程进行评估，同时找到其所在的位置，并决定它们将来在连续统一体上希望处于什么位置（Harden 等人 1999）。描述未来医学院的十个维度为学校规划未来发展提供了工具。正如 SPICES 模型所发现的那样，有必要邀请包括学生，教师，应届毕业生和患者在内的各种利益相关者考虑学校目前在各个方面的位置，以及他们希望学校在未来五年和十年后处于什么位置。每个维度选项呈现的不是二元决策，其观点并不两极分化，支持或反对一种方法，而是作为一系列的连续体，学校现在和未来都可以在这些连续体上取得进展。

毫无疑问，朝着本文所建议的方向前进并不会一帆风顺。前进路上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如教师阻力、资源匮乏，以及学生担忧的学习时间，特别是如果学习与国家规定的考试不匹配等，当然我们不希望会出现这些情况。然而，维持现状必然不行。教师和其他致力于教育的人不应该坐以待毙，他们应该成为学校创造令人憧憬未来中的一部分。正如 Geurin（2017）指出的那样：“最好的解决方案不是现成的。它们来自于不同的角度更深层次的思考。努力工作，挑战现状，思考更深层次问题，

用全新有趣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从象牙塔走向现实世界的真实课程

未来医学院校的首要特征或最重要的特征是：需要优先考虑建设“真实课程”，即医学生毕业后能运用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去满足未来服务人群的课程。这一目标可以通过采取基于学习成果和胜任力导向的教学方法得以实现（Harden 等人 1999），而学校整体的学习成果得益于每一门课程改进和学习机会的贡献。

真实课程的学习环境将有利于支撑学生专业发展和未来福祉。在医学生的最后一年教学计划应纳入学生发展课程，使其在临床照顾病人过程中形成职业认同感，加强责任心。

未来医学院校不仅应对毕业时的学生负责，而且要对学生毕业 6 个月或 6 年后负责。随着时间推移和卫生系统发展的需要，当前医生培训模式将依据对医生新的认识而发生改变。如从医生入门到开展医学研究所需要的速成培训，以及通科医生和临床各科诊疗医生需要的长期拓展训练等将采取完全不同的课程体系和培训方式。

从案例学习到即时学习

从案例学习转向即时学习将是未来医学院校的一个根本特征。

掌握医学词汇、核心知识和基本概念，以及对医学未来发展前景的认识非常重要。同样，当医生需要了解某件事时他能提出正确的问题，知道去哪里找答案，以及具备知道答案后对答案进行评估的能力（Friedman 等人 2016）也非常重要。在未来的医学院校，教师将从信息提供者转变为当学生需要时帮助其找到信息的教练（Harden 和 Lilley 2018）。

未来的医学院校从案例学习转变为即时学习，需要在文化层面进行

重大转变，涉及了学习成果预期，系列讲座开设，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以及学生学业考核评估等多方面的变革。

从基础与临床学科分化到相互交融

SPICES 课程开发模型（Harden et al.1984）强调了教育计划或课程转向更深层次纵向整合的必要性，这也是英国医学委员会（UK General Medical Council）和其他认证机构所建议的。

在以后几年里，基础医学相关知识的学习与传授将与临床实践技能教学和临床流程相结合，并嵌入在学生的学习和评估过程中。

从低估教学与教师重要性到转变认识

医学院校在教育项目上的优异表现正日益得到认可，但院长们却常常忘记这一点，教师是教育项目成功的关键。未来的医学院校将优先考虑从事教学的教师聘用、认定、培训和奖励，所有的教师都将展示其教学学术功力，反思教学，尝试教学改进和实践应用研究。正如斯坦豪斯（1975）所指出的那样：“教师将是基于对学校的理解而最后改变学校的人。”教育研究不应只是为教师提供理论参考。教师除了被当作研究对象外，更应该是作为研究人员参与研究。未来的教师将作为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课程和学校教育项目的发展。

教师作为专业人士，会透过持续的员工发展活动不断掌握最新的教育方法。未来医学院校文化将发生变化，教师发展将放在学校需求层次的更高优先位置，并根据每位教师的需求和角色设定个性化培养项目。

从学生作为客户到以伙伴相待

学生在教育项目学习过程中角色已经从“客户”变成了“消费者”加“合作伙伴”，并在参与学校管理、课程规划、教育项目、同伴教学、项目评估、学生招生筛选、参与创建学习资源、评估练习，以及支持独

立和适应性学习等方面继续转变角色 (Tackett et al. 2018)。未来学生还将参与员工面试, 实施过学生参与面试的学校发现, 学生参与面试能提供崭新的视野和有益见解。学生参与教育过程是当前六个追求卓越的主题之一 (Harden 2018)。

未来医学院校将会有一种适应性课程, 此类课程将根据每个学习者的经验来调整课程进度、持续时间和学习策略, 以不断适应学生个人独特、持续变化的特点和学习储备 (Jason and Westberg 2018)。

学生的学习将通过数字化学习指南来支持,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人在线学习助理 (POLA)。POLA 以帮助学生评估学习成果, 推荐合适学习机会。在 POLA 的支持下, 学生将承担更多的学习责任, 从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转向自我主导学习。

未来所有医学生都将接受部分教育教学课程培训, 以使他们具备教育教学理解力和相关知识技能。这不仅使学生在教学项目中能发挥积极作用, 而且能够为开展医学教育研究和发表文章等贡献力量。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趋势, 在《医学教师》(Medical Teacher) 杂志上, 学生作为合著者发表的论文数量从 2000 年的 3% 增加到 2017 年的 15% (Harden et al. 2018)。

从神秘之途到地图之旅

目前, 在课程和学生学习的最终目标之间往往只存在伪相关性, 也就是说在没有真正的理解学生成为医生应该完成哪些学习路径和步骤之前, 只因为表面原因就让学生学习某项专题知识, 这好比是一场“神秘之旅”。所谓的神秘是指在达成目标进程中, 对前一个领域的研究有助于下一个领域的理解的过程缺少透明度。

未来学校将会会有一个课程关系图, 关系图上显示了目的地(学习成果)

和学生到达目的地的路径（学习机会）（Harden 2001），图上的其他路径则是恰当的评估方式、教育计划相关的课程或模块，以及教师职责等。学生可以利用“地图”绘制自己的教育旅程，记录旅程中的进步，并在每个阶段评估自己的理解和成就。

同样，医学课程地图也将显示共同的目的地，目的地中包含了专业人员的期望，以及可以共享的旅程和学习机会。由于医学专家、教育学家和教学技术专家等主要参与者之间难以建立协作关系，迄今为止课程改革的进展比预期的要慢。教育思想的进步包括以成果为导向的教育，以及相关各方更好的合作，此有助于建立多维课程地图，这是未来医学院校的一个关键元素和工具。

从标准统一的练习到适应性课程

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将每个患者都视为需要个性化管理的个体。个性化医疗日益成为医疗实践的一个特征。同样，学生也各不相同，但个性化教育直到最近才开始被少量人关注。钻石需要打磨，同样鹅卵石也需要磨光。此促成了一项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测试自己的理解能力发展的独立学习计划（Harden et al.1969）。

未来医学院校将从课程时间固定而学习标准不确定的课程模式转变为课程要素和时间可变但学习标准确定的模式（Frank 等人 2017）。

适应性课程分为不同水平层次，在单一课程或整个课程体系中将个性化学习机会与模块或单元相关联。学生在模拟中心体验、翻转课堂准备或听录音讲座时将不规定具体时长，也不以分钟或小时为计算单位，而是取决于达到活动的学习成果所花费的时间。学生将被允许以不同的速度完成课程模块，提前完成时提供可选修额外的课程，教学管理部门或教师可用徽章或证书来表彰他们取得的额外成就。制作一个能让学习

者在不同时间完成课程并取得相应资格的项目难度更大，但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目标。

从不能学以致用用到有效和创造性运用技术

科技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医学教育，然而，当今技术的发展趋势只是在效率层面上改进过去的教学系统，就像把网上学习作为“笼中鸟”还是“展翅鹰”？（哈登 2008），我们需要更有创造性地规划用科技来支持教育变革，没有教育技术上的变革不可能实现教育变革。

在过去的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科技应用到了教育中，其中包括电子学习、精准仿真模拟，以及更简单教学反馈系统等。未来对科技创造性和有意义的利用无疑将成为医学院校的显著特征，并使上文提到的适应性学习方法等成为可能。在巴伯等人（2013）介绍公共政策研究的《雪崩已经到来》报告中提到，哈佛大学名誉主席认为，“就像过去 20 年全球化和科技改变了经济等巨大领域一样，未来 20 年，大学也将面临转型。”

对学习的分析也将在未来的医学院校发挥重要作用（梅农等人 2017）。正如 Ellaway 等人（2014）所主张的那样，“医学教育工作者需要做好准备，以应对大数据复杂而又引人注目的分析能力和发展动态带来的变化”。

从分类评估向项目为中心的学习评估的转变

在未来医学院校的评估方法中，诸如绩效评估，基于能力的评估，学习评估，程序评估，以及通过测验提升学习成果等方式将会得到巩固和突出。这类评估将反映现实课程情况，确保学生已经具备了在胜任执业医师岗位的必要能力。

评估结果的详细分析不仅与个别学生相关，而且还对教学计划和课程决策产生广泛的影响。未来，评估不会根据单一时间点和单一检查结

果做出结论，而是以项目为重点或采用程序化方法，对不同来源的证明材料进行长期收集汇总和分析并做出评估决策。

从孤立工作到更多协同

合作将是未来医学院校的一个重要特征——教育计划实施过程中进行内部合作、与其他机构合作，以及在本科、研究生到继续医学教育不同教育阶段的合作。

在医学院校，教师在不同阶段横向和纵向整合课程之间相互协作将成为特点，而非仅仅装点门面。此外还包括了与教育学、其他专业专家，以及患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密切合作（Wilkinson 2018）。

在过去，学习常常是一种单独练习。学生们听讲座，做笔记，利用书本或其他辅助工具进行自学，虽然在基于问题的学习（PBL）上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合作，但在未来医学院校中，高程度的协作、强大的社区网络和点对点教学将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合作范围还将扩大到院校之外，甚至涉及到全国和国际上其他机构。

未来的医学院校将不再是自给自足和独立。在教育计划实施过程中，将与其他国内学校和国际学校分享课程、教师、专业知识、学习资源和学习机会，把教育项目进行分拆或外包后将会有所获益。

未来医学院校本科、研究生和继续教育不同阶段之间在教育战略、学习成果、评估和财务方面的交流将不再孤立运作，课程将是“连续统一体”扩展课程一部分，学生和实习生的学习进度将绘制在课程地图上，并记录在学习和评估档案中。

（转载自“浙江大学医学院教师发展中心”微信公众号 编辑&翻译：
陈佳佳）

来茂德：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药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披甲、逆行出征，成为新时代最闪亮的英雄。作为医学、药学的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在思考，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健康挑战，如何提升全社会对医药学重要性的认识，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来学医药，提升我国的医药学教育水平？”来茂德是德国科学院最早的五位中国籍院士之一，曾经是浙江医科大学和浙江大学最年轻的副校长，2013年出任中国药科大学校长。他对中国医药教育的认识非常深刻。

社会要重新认识医学的重要性

来茂德说，正所谓“大疫之中有大医”。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历过与传染病的顽强斗争。拿我国来说，从一百多年前东北鼠疫，到2003年的SARS，再到今年的新冠病毒，都是医护人员拼搏在最前线。在这次疫情中，医疗卫生事业最大的收获就是整个社会的民众对医学在社会发展和保健中的重要作用有了很好的认识。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成为“全民偶像”，那些驰援湖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成为民众心中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来茂德认为，只有医学做强，国家才能有更好地服务百姓。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武汉控制住，这正是因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务工作者，这些人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医护

人员的职业操守。此外，非典的第一例诊断的病例是在 2002 年的 11 月 14 日，但直到 2003 年的 4 月 16 日才确定致病原为一种新的病毒，其间花费了 5 个多月的时间。而在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 7 天确定了病原，9 天完成了基因组测序，19 天诊断试剂盒就能够发放下去，这离不开我国医药学在短短 18 年的飞速发展。

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

来茂德有着多年在国外学习、工作的经验，他认为：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高等教育都已经做到了大众化、普及化。即便如此，医药教育永远都是精英教育，需要吸引最优秀的人来学医药。但我们国家现阶段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比如医学和药学在招生方面的总体吸引力还不是很强。据媒体报道，去年北方有一所学校，医学方面的录取分数线还不如兽医的分数线高。

如何吸引？来茂德认为，这需要社会与国家共同努力。从社会层面上，这几年医患矛盾问题不少。我们需要用法律去规范每个人的行为，这个规范是两方面的，既包括规范病人的行为，也包括规范医生的行为。医生要尊重病人，如果医生有不良的行为需要接受法律的处置。病人对医生有意见，正确的措施是选择去“告”，而不是去“闹”。如果病人有违法行为，同样也要受到法律制裁。只有用法律去规范，医生才能感受到职业的获得感、安全感。

从国家层面上，首先要增加医生数量。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8 年，我国每千人的医生数是 2.59，护士数是 2.94，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德国、奥地利的每千人医生数 4 人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千人医生数量也要与此相适应，以满足百姓的需求。

同时,还需要调整医务人员的结构。一是调整城乡医务人员的结构,二是要调整医院内部科室人员的结构。我国农村每千人医生数是 1.8,大概是城市的 45%,连一半都不到,高水平的医生都集中在城市里的三甲医院。这种差别与我们国家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医院内部科室人员的结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各专业医生的结构比例失调,我们缺儿科、精神科、病理科、康复科等方面的医生,感染科医生也不足。此外,公共卫生医生数量少、流失严重,这与社会大环境以及职业待遇和获得感有关。

如何解决医生数量少、结构不平衡的问题?来茂德有两点建议:一是扩大综合性大学医学生的招生数量,特别是那些受之前大学合并影响,合并了许多优秀医学专科学校的综合性大学;二是针对部分学科医生的缺乏,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去引导学生,采取“大医学小专科”的方式,医学生先接受系统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习,在毕业之后再选择专攻的科室从事医学工作。

如何将医学教育做得更好

来茂德说,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绝不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后挑战,因而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将医学教育做得更好。他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1. 学制。医学生的学制长且不统一,比如有 3 年的大专、5 年的本科,前几年还有过 7 年制的硕士,现在有 8 年制的博士等等。希望能够从国家层面统一医学生的学制时长,目前医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以 5 年制为基础,毕业以后加 3 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之后再加 3 年的专科医生培养。

2. 培养的针对性。医疗是一个系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医学专业,另一类是医学相关专业,例如护士、呼吸治疗师、放射科技师等。

我们不仅需要培养看病的医生，还要培养操作各类医学仪器的技师。比如这次疫情期间大家经常听到的人工心肺机 ECMO（体外膜氧合），这类机器可以培养专门的技师去操作，以辅助医生的治疗。

3. 知识范围。严格来说，医学是“人学”，“人学”对人文关怀有很高的要求。医学生除了医学本身的知识外，还需要学习社会学、艺术学、经济学、卫生学和法学，学习医学发展史和医学伦理学，知悉基因治疗、基因编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伦理边界和法律法规。

4. 实践。医学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是现在的医学生毕业后并不能很快上手术台，因此必须投入很多资金为学生提供培训的基地。不仅如此，普通病人去医院看病时，他们从心理上不愿意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医学生来为自己“把脉问诊”。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更需加大对于医学生培养的投入。

5. 名医。做医生最基本的就是给病人看病，想要成为名医还要多做研究、发论文，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两者兼顾，我们培养的医生大多数应该是为老百姓看病的医生，因此医生的评价和职称晋升的条件一定要与之相匹配。

（来源：光明微教育 记者：郑晋鸣）

高校部署“过紧日子”

近期，包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就“过紧日子”作新一轮安排部署。其中，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指出，不仅要“过紧日子”，还要有“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

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官网5月22日消息显示，校党委委员、总会计师闫天池5月21日下午在木樨地校区主持召开学校财务工作专项推进会，会议强调，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影响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影响，学校2020年财政拨款被大幅度压减，自有资金收入也将出现大幅降低，给学校办学经费运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计划财务处全体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有的清醒认识，真正感受到压力和责任，主动作为，励精图强，迎难而上。

会议强调，着力从五个方面下功夫，包括全面做好“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坚持勤俭办学，广泛开源节流，大力压减“三公经费”支出和不必要的公用支出，切实保障日常基本运行、教学科研、人员经费等刚性支出；进一步提高工作精细度，对2020年所有的财政项目进行认真分析与合理调整，以适应预算压减后的基本要求，针对校内预算进行重新规划和有序调整等。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网5月20日消息称，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在笃行

楼举行党委常委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学校党委书记章熙春指出，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央和教育部关于“过紧日子”的精神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过紧日子”的重大意义，将“过紧日子”的要求贯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引导广大师生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贪图享乐、铺张浪费，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要加快建立现代财务制度，严格规范预算管理，硬化预算约束，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确保集中力量办大事。

另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闻网 5 月 19 日报道称，为了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倡导勤俭节约，杜绝铺张浪费，把资源用在学校发展的刀刃上，“让师生过好日子”，近日，学校从结构、规模、绩效等方面对预算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大幅压减了日常支出，保证了人员支出和学校中心工作资金需求。

稍早前的 5 月 15 日，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过紧日子”的工作要求，中国传媒大学在明德楼报告厅召开贯彻落实“过紧日子”工作会议。财务处处长朱军红介绍了 2020 年学校预算收支总体情况，主要对财政预算调整、学校预期收入下降及整体支出安排等情况做了重点汇报。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指出，要做好对形势的研判，认清形势的严峻性，不仅要“过紧日子”，还要有“过苦日子”的思想准备。要解决思想上的矛盾，中层干部是核心，各单位要统一思想，面对挑战，团结一心，形成合力、共渡难关。要科学、理性地认识“过紧日子”，该省的钱一分也不能浪费，有限的资金要用到刀刃上；该执行的专项资金，

必须按要求刚性执行。既要保运行、保重点，更要谋发展。

此前报道：科研经费压减千万元！多所高校开始“过紧日子”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过紧日子”提出更严格要求。有迹象表明，国内各高校最近也有了“动静”。

例如，江南大学5月7日发布通知称，该校2020年基本科研业务费由5085万元压减为3745万元，同时使用经费已超原计划75%的项目，经费将被冻结至9月30日。

此前，受疫情影响，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在内的欧美多所高校通过取消招聘、冻结工资、推迟项目等多种举措，积极应对可能到来的财务危机。

国内高校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过紧日子”？科学网进行了盘点。

江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压减1340万元江南大学公开的调整方案显示，该校今年的基本科研业务费由5085万元压减为3745万元，共压减1340万元。

此外，有两项规定值得关注。

一是该校所有基本科研计划项目经费按照原计划的75%进行统一压减、核算和使用。

二是自通知之日起使用经费已超过原计划75%的项目予以冻结，9月30日前不再给予使用。9月30日后可提出书面申请，申请额度不得超过原计划所剩的额度。

此外，通知还提到，各类别项目要求对压减核拨的经费，在2020年6月30日前执行率达到50%及以上，8月31日前执行率达到75%及以上，

9月30日前使用完毕。在9月30日前未使用完毕的项目经费予以收回，统一用于已使用完毕的项目后续申请使用。

同时，在9月30日前使用完毕且同时满足任务书中6月30日和8月31日考核节点要求的项目（不含青年基金项目）可向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总额不得超过项目压减额度。所有提出申请的项目，管理部门按照经费使用完毕时间先后和考核点执行率高低等条件安排和分配继续使用经费的额度。

中国农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削减517万元

5月6日，中国农业大学也公布了该校本科教学经费调整方案，将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削减517万元。

具体经费调整方案为：信电学院公共教室改造削减200万元，示范性教学团队建设削减255万元，专业实习实践条件建设削减22万元，虚拟实验教学项目削减40万元。

此外，还有不少高校对下一阶段的经费使用作出安排。

5月6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防控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17次会议提出，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遵照压减学校今年经费要求，加紧做好经费预算调整工作，因时因势调整工作举措，全力保障学校重点任务推进落实。

同一天，华中农业大学第13周工作调度会议要求，各单位和全校师生要全面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毫一厘节约起，精打细算，真过紧日子；要坚持把钱用到刀刃上，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其实，早在去年 12 月 17 日，教育部召开的 2020 年部门预算“二上”培训会议上，就要求各高校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用好办学经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集中力量办大事。（注：一般来讲，预算有“两上两下”编制程序。“二上”指预算单位报送收支计划、财政部审核后，预算单位进行修改调整后的再次报送。）

“二上”培训会议后，包括浙江大学、南开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在内的多所高校，都公开了各自的决策部署。

眼下，再加上疫情影响，对科教界来说，“过紧日子”以后将成为常态。

（来源：澎湃新闻，科学网）

又一超强跨地区高校联盟成立

5月12日下午，四川重庆地区20所大学共同发起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校联盟”正式成立，其中四川高校有12所，重庆高校有8所。

四川高校有：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西华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重庆高校有：重庆大学、西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

20所联盟高校为更好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目标实现提供人才保障、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

据四川日报报道，相关合作包括联盟成员间教师可共引共享、互聘互用，跨学校授课、跨学校指导学生，两地学生可跨校交流与培养，探索推动学分互换认定机制，建设成渝跨区域高校联合实验室等。

联盟成员间建立创新人才培养联合基地，联合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推动联盟成员学校间学生跨校交流与培养，探索推动学分互换认定机制。两地学生线上课程资源可以共享，两地学生还可以联合开展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社会实践与校园文化等活动。

联盟成员间的教师可以共引共享、互聘互用，跨学校授课，跨学校指导学生等。两地可以共同召开双城经济圈高校引才大会，开展教师联合招聘与培训工作。推动双城经济圈内政府对高校人事人才、社会保障政策逐步统一。共同探索人才评价体制机制研究，联盟高校要选派优秀干部相互挂职锻炼。

科研合作是此次联盟的“重头戏”。相互开放联盟成员学校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优势科研平台。联合参与西部科学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共建。建立科研交流与合作、联合科技攻关机制，联合申报和承担国家重大研究项目或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建立技术创新产业联盟。建立技术成果转让协同联动机制，创建技术转移联盟，共同引导技术要素市场化自由流动。联合举办各类高端学术论坛。

在此之前，不少高校联盟相继成立，比如：

C9 联盟

2009年10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9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成立“C9联盟”，意在建设“中国常青藤”。

这9所“985工程”建设高校签订了《一流大学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协议书》，9所高校将通过实施本科生交流和研究生联合培养、开展教学与教改研究等措施，共同培养拔尖人才。

2014年，中国科学院大学正式参与C9联盟活动。

E9 联盟

2011年，9所以理工科为特色的国家“985工程”大学组成“卓越人才培养合作高校联盟”（简称：卓越大学联盟 Excellence 9）。

这9所高校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Z14 联盟

2013年7月，“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高校协作联盟成立，2016年更名为中西部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联盟，简称为：中西部一省一校联盟（Z14）。

参加联盟的高校有河北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南昌大学、郑州大学、广西大学、海南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西藏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4所大学。

工业和信息化部高校联盟（国防七子）

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高校联盟成立大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

成员高校为被称为“国防七子”、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属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7所高校。

这些高校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培养出很多高精尖人才。

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

2019年，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在复旦大学正式成立。

长三角高校智库联盟由复旦大学倡议，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五所联盟高校共同发起，面向区域内外智库开放，旨在着力发挥长三角高校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国际合作优势，计划通过联合研究、互鉴特色、人才培养等机制，逐渐形成一体化的引领性智库集群。

（来源：《中国青年报》综合自四川日报、中国新闻网、中青报报道）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